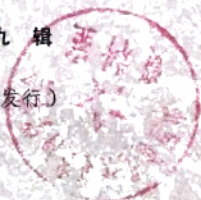


28

甘肃文史资料选辑

第九辑

(内部发行)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目 录

王维舟同志在庆阳的几件事·····	李有义(1)
参加红军长征前后的回忆·····	董 邦(12)
我在抗大学习及参加党在兰州	
地下工作概况·····	窦志安(30)
王孝锡烈士事略·····	张小民(37)
梁干丞同志被捕前后·····	常黎夫(47)
梁干丞同志之死·····	王新潮(48)
梁干丞烈士回忆片断·····	王永兴(50)
罗云鹏同志在狱中的斗争·····	张 英(52)
国民军入甘及刘郁芬在甘肃的	
军事活动·····	姚凌九(77)
刘郁芬与河州事变·····	樊曼云(110)
国民军第二师入甘和刘郁芬	
在甘肃的统治·····	张寿龄(128)
西北军兰州战役和进占陇南经过·····	俞方皋(144)

我所知道的马廷贤..... 马培清(150)

马廷贤在陇南的暴行

马廷贤攻陷天水见闻..... 贾琴怡(169)

马廷贤部暴行目睹记..... 周季第(172)

马廷贤部屠礼县追记..... 赵廷举(176)

宁夏和平解放亲历记..... 马廷秀(179)

伪甘肃省府西逃及投诚经过..... 赵世英(196)

王维舟同志在庆阳的几件事

李 有 义

王维舟同志是我党一位优秀的党员，他一贯忠于党，忠于人民，谦虚谨慎，平易近人，生活朴素，关心同志，很受广大群众、战士和干部的爱戴，毛主席曾给他亲笔书赠“忠心耿耿，为党为国”的题词。我曾在他身边工作过将近五年，亲眼看见过他呕心沥血、艰苦创业，为老百姓办事，关心群众，热爱战士的许多动人事迹。至今回忆起来，犹如昨天发生的一样，他的音容笑貌，不时在我的脑子里浮现。

(一)

三八五旅是一九三七年冬天到庆阳的，当时我是个十五岁的娃娃，家里很穷，母亲在地主家当保姆。一九三八年三月在生活的逼迫下，我参加了八路军，参军后被分配到三八五旅政治部民运科工作，经常能够见到王维舟同志。到了一九四一年，我又调去给王维舟同志当警卫员，一直到一九四五年。

王维舟同志是四川省宣汉县人，生于一八八七年。他早年就投身于中国人民的伟大解放事业，参加过辛亥革命。一九二〇年他参加朝鲜共产党上海支部，不久到苏联学习，回国后参加了吴

玉章同志组织的“赤心社”。一九二七年由朝鲜共产党转入中国共产党，在党的领导下，长期从事革命武装斗争。

三八五旅来到庆阳时，旅部设在庆城北关田家城，旅部下设好几个机构，有司令部、政治部、供给部、教导营、野战医院等。那时，部队的生活、住房等方面都有很多困难，特别是部队的驻地营房，都要借老百姓的房子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王维舟同志和干部战士商量，要自力更生，并亲自带领干部战士打窑洞，解决部队的住宿问题。他年过半百，精神却是那么的饱满，扛上镢头铁锹到工地和战士们一块铲土，打窑洞。有一次，教导营的战士刷崖面，他扛着镢头来到了工地，崖面上有一个马鞍形的土岭，他看了看说：“你们离远点，让我来放鞍。”说着就拿着镢头上坡。我怕首长有危险，就拉着他的手说：“首长，你是五十岁的人了，这么陡的坡还是让我来干吧。”王维舟同志风趣地笑了笑说：“你干，你那么大点个子能干，我怕危险，难道战士们都不怕危险吗？”说着就爬上土坡，抡着镢头干了起来，一会儿就把马鞍形的土岭放掉了。大伙儿见首长干活这样认真，劲头更大了。就这样，在王维舟同志的带领下，经过一个冬春的苦战，终于在麻家湾、田家城等地打出了一百多孔窑洞，解决了部队住房问题。王维舟同志不论干啥，都是亲自带头，战士们都赞颂他的实干精神。一九三九年，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，边区的军民生活非常艰苦。党中央和毛主席在延安发出了“自力更生，丰衣足食”的伟大号召。王维舟同志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，组织干部战士在旅部直属机关办起了饲养场、木匠坊、铁匠坊、豆腐坊、“八一”商店、联合工厂等，以实际行动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。他经常到西道坡（现在庆阳县法院所在地）联合工厂纺线，一纺就是多半夜，而且纺得又细又长，战

士很佩服王旅长纺线的技术。他不仅亲自纺线，还带领干部战士开荒种地，亲自选择地块，虚心向当地老百姓请教，看哪块地能种，应该种些什么，并不占老百姓的一亩好地。因此，部队选择的地块都是群众不种的乱石滩，石头多，土质差，用镢头挖非常吃力。他和战士们商量，借来了铁钎、铁棍撬掉石头，然后一镢一镢地开荒。他还和小伙子们比赛，看谁开得地多，谁的干劲大。就这样，当年就开出了上百亩荒地，除种庄稼外，还种了黄瓜、茄子、白菜、西红柿、小葱等，秋后庄稼收成很好，果实累累，解决了部队的生活困难。

王维舟同志不仅有一股艰苦创业的精神，而且还有一股实干精神，对干部战士教育很深。

(二)

关心群众疾苦，爱护群众，是王维舟同志的一贯品质。王维舟同志虽然担任旅长，但没有一点官架子，总是那样平易近人，脸上时常挂着慈祥、善良、忠厚的笑容。他心肠好，性情温和，态度和蔼，当地老百姓都亲切地叫他“王善人”。

说起他这“王善人”的外号，还有一段来历。一九三九年六月的一天中午，我刚吃过饭，在院子溜跬，王维舟同志来到我的身边，拍着我的肩膀亲切地问：“小李子，吃过饭么？”我回答说吃过了。他就对我说：“炊事员很辛苦，现在没事，咱们下河给挑两担水吧。”我答应了一声，就跟着他挑水去了。

当我们把水挑到城墙下休息时，忽然看见一个中年妇女，带着一个衣服褴褛的孩子在城墙上挖什么东西。王维舟同志每逢见到老百姓，不管是大人娃娃，总是热情地问寒问暖，于是他放下扁

担，走到那位妇女跟前问：“老乡，你挖啥呀？”那位妇女回答家里没有吃的了，她见我们是军人，便激动地说：“你们是八路军吗？我见过八路军，八路军是好人，只有八路军才自己挑水。”我听后正要回答我们就是八路军时，王维舟同志却接上头话说：“城墙上怎么能挖出吃的呢？”那妇女见问，就从篮子里取出一块土疙瘩说：“就这个，这叫‘白板土’，人饿极了时咬上几口充饥。”王旅长听了难过的点了点头，他拉着那个小孩子的手说：“这东西吃不成，到我们家去。”

王维舟同志和我挑着水，领着那位妇女和小孩回到了旅部后，就热情地把她们母子招呼到自己家里，倒了两碗水，让他们坐下喝，然后又叫我到伙房里取来几个蒸馍。那妇女见旅长对他们如此热情，激动得热泪盈眶，不知说什么好，连蒸馍都忘了接，只是一个劲地看着王旅长。那小孩看来已经很饿了，急忙拿起一个蒸馍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。

王旅长坐在凳子上，抽着烟和那位妇女拉起了家常。原来，这位妇女是莲池村里一户地主的佃户，她丈夫史华是民兵营长，在延安学习去了，家里有五个孩子，四男一女，都还很小，一年到头，辛辛苦苦打下的粮食大部分缴了地租，时常揭不开锅，没法子就靠糠和酸枣磨下的炒面，再没法子，就捋些榆树叶和城上的“白板土”和着吃，全家七口人仅有一床破被，生活十分贫穷。

王旅长听了那位妇女的诉说，难过地说：“老乡，我们的政权刚建立，群众的生活还很苦，特别是乡下的农民，缺吃少穿的人很多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逐步解决。”旅长说着写了一张纸条，大意是：要庆阳县政府给这位妇女五斗米和一些钱，先解决无米之炊。旅长把条子写好后交给我，让我领着那位妇女去县政府办理。接着，他又把自己孩子的旧衣服取来给这个孩子穿在身上。

那位妇女感激地说：“你们八路军真是好人，这孩子从生下来还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哩！请把你们的姓名告诉我，我们以后好报答。”王旅长笑了笑说：“我们是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队伍，记住党和毛主席的恩情就是了。”这妇女听后嘴里喃喃地说：“毛主席……共产党……”于是，我就领着那位妇女到县政府，领了粮和钱。一路上，那位妇女一再要问王旅长的名姓，我告诉他说：“他是咱们八路军三八五旅的旅长，叫王维舟，四川人。”那妇女听后嘴里反复默念着旅长的名字，连连说：“善人，真是善人！”从此“王善人”的称呼就在老百姓和干部战士中间很快传开了。那时候的老百姓，只知道世上有善人、恶人，他们把那些为人民办好事的称善人，把那些骑在人民头上的地主恶霸叫恶人，老百姓把王旅长称善人的真正含义就在这里。

还有一件事，想起来也真叫人感动。

那是一九三八年夏季的一天，我们警卫班的战士跟随王旅长到离城不远的的一个村子，给老乡割麦子。临走前，他一再给我们叮咛：干活时一定要遵守“三大纪律，八项注意”，不能损害群众的利益。进村后，我们知道有一户老乡家里劳力少，忙不过来。我们和王旅长就向这个老乡的地头走去。来到地头，只见那老乡一个人在汗流夹背地割着麦子。王旅长用浓重的四川话向那位老乡说：“老乡，我们给你割麦子来了。”老乡一听喜出望外，满面笑容地迎上前来，高兴地拉着我们的手，不知说啥才好，只是一个劲地说：“谢谢，谢谢。”王旅长风趣地说，“还没割哩，有啥谢头呢！”说完，就和我们一起你追我赶，说说笑笑地干了起来。

将近中午时，我们和旅长在地头一棵大树下休息，吃着带来的干粮，喝着开水。这时，那位老乡笑容满面地从村里走来了，

手里提了个篮子，里面装着十几个鸡蛋和油烙饼，忙着招呼我们，塞到我们的手里硬让我们吃。旅长一边推让，一边解释说：

“我们是毛主席领导的队伍，有纪律。再说我们刚吃过干粮，还不饿。”硬是一个也没吃。那位老乡拿着馍和鸡蛋，激动得直流泪。

下午干活时，一个战士不小心弄坏了老乡的一把镰刀。王旅长看见后，就要这位战士去赔钱。那位老乡见我们干活不吃饭，损坏了镰刀还要赔，就说：“这象什么话，给我家干活不吃饭，坏了把镰刀还要赔。”说什么也不行。王旅长这时又向那位老乡解释说：“八路军是为人民服务的，损坏东西要赔偿，这是规矩。”硬是让那位老乡接了钱。老乡高兴地说：“没想到，天底下还真有这么好的人！”

(三)

王维舟同志心里时时刻刻装着群众，想着人民，替人民说话，为老百姓办事。因此，当地的老百姓有了难处就找他，有什么冤仇也找他谈。他虽然工作很忙，但总是热情予以解决。

一九四二年的一天，我正在旅部院子里闲坐。这时，门里走进一个头发斑白、拄着拐棍的老大娘，脚步蹒跚行走艰难的向我走来，呻吟着问：“小伙子，王旅长就住在这吗？”我问那位老大娘：“老大娘，你找他有话说，还是捎信？”老大娘望了我一眼，吃力地伸过脖子说：“我是找他来治病的。”我一看，原来那位老大娘脖子上长了一个痈疮，红肿溃烂，流着浓血。我心想王旅长工作很忙，你这老大娘真怪，治病也要找旅长，故意哄她说旅长不在。谁知道王旅长却闻声走了出来，问是怎么回事。我

忙向王旅长汇报，说这个老大娘脖子上生了个痈疮，来找你治病。王旅长一听，急忙上前搀扶着老太太走进了他的办公室，然后倒了一杯开水递到她的手中，热情地问起老大娘的病情。老大娘激动地含着泪说：“前几月我害下了这痈疮，越长越大，没钱治疗，一直拖到现在，痛得难受呀！麻烦你们帮我治治。”王旅长听后，立即派我把老大娘领到旅部野战医院。到医院后，经大夫诊断要动手术，可医院的设备条件差，做这样的手术还不行。王旅长知道后又立即向延安中央医院发了电报，要求派大夫来为这位老大娘治疗、动手术。中央医院收到电报后不久，就派来两名大夫，其中一名还是苏联的外科大夫。经过十几天的精心治疗，终于为这位老大娘治好了病。老大娘住院期间，王旅长还多次到医院看望，送好吃的，使这位老大娘非常感激，不住地说：“王旅长，你真能为咱老百姓办事。”

一九四三年，一次王旅长到华池县大凤川检查部队开荒种地情况。路过一个村子时，看见一位老乡站在西瓜地头，顿足捶胸，边生气，边骂街。王旅长急忙从马上跳下来，上前询问缘由。老乡说他辛辛苦苦种了十几亩西瓜，昨天晚上，不知哪个断了肠子的给他提了蔓，毁了瓜，他一家人就指望着这十亩瓜，这下可怎么办呢？说完哭了起来。王旅长听后十分生气，走上地畔一望，十亩西瓜，东一堆，西一堆，瓜蔓和没熟的西瓜摆了一地。他就安慰那位老乡说：“老乡不要难过了。我们决不能让好人受委屈，我替你到区政府告状去！”随后，我们策马来到了新堡区政府。他亲自找见区长，把这件事作了反映，并要求政府马上调查清楚，严肃处理，老百姓辛辛苦苦种了一年的西瓜，不能让坏人损害。

当我们从大凤川回来路过新堡区政府时，王旅长又问起这件

事，区长向他从头到尾作了汇报。原来，在那位老乡的村里，有一个人和他心眼不和，闹了纠纷，借机报复，毁了西瓜。区政府查清后，让那个人全部赔偿了十亩西瓜的损失，并向受害者赔情道歉。当地群众知道王旅长为老百姓告状的事，都交口称赞。

王旅长不但为老百姓办事，对同志更是关怀备至，暖如春风。在三八五旅里，干部与战士上下级之间，都充满了同志友爱，手足深情。有一次，旅部“八一”商店主任汪银祖同志，因年龄大没成家，思想开了小差，借故有病，卧床不起。王维舟同志知道后，亲自去看望他。汪银祖见旅长来看望他，只是哭，不讲病因。王维舟同志就积极开导说：“你有啥困难解决不了，就向组织反映，组织帮你解决。”汪银祖还是默默无言，不肯暴露思想。后来，王旅长经过调查了解，知道汪银祖有思想包袱，就再次去找汪银祖谈话，帮助他解思想疙瘩，并积极想方设法托人为汪银祖介绍对象，很快使汪银祖解除了思想苦闷，找到爱人，结了婚，工作很积极。干部战士都说：“王旅长这个‘红娘’做得好极了”。还有一次，长征老战士、旅供给部主任王世远病了，住在医院里。王旅长知道后，就亲自跑到医院看望，安慰他安心养病。后来王世远去世了，他又亲自筹办丧事，并主持了追悼会。除此而外，他还经常给医院送西红柿，到病房照顾病人。随时和干部战士谈心，对每一个干部战士就象自己亲人一样关心，不管谁有啥事，他都千方百计地帮助解决，很受干部战士的爱戴和欢迎。就说我吧，十六岁参军，给他当警卫员时也不过二十岁，由于我家中生活贫困，自小没识下几个字，懂得的革命道理少，给王旅长当了警卫员后，他时常给我说：“小李子哟，乘年轻要好好学习些知识哩！”并亲自给我订笔记本，给我买了铅笔，还时常手把手地教我写字认字，给我布置作业，教文化，讲革命道理，

使我这个斗大的字识不了几箩筐的穷孩子，逐渐学会了看报、读书，还会写一些小文章。看到我的进步，王旅长从心眼里高兴，不时地鼓励我。他真比自己的亲人还亲啊！

(四)

王维舟同志生活艰苦朴素，无论对自己还是家属子女，要求都很严格。每次吃过饭，他都要舔碗。开始，我们觉得有些好笑，心想：“谁家旅长还舔碗哩！”慢慢地，这一件小事却教育了我，使我们感到这正是勤俭持家的好作风。对于公家的便宜，他更是分文不沾。记得一九四五年，他被党中央调去担任解放成都部队的副司令员，临走时，他一针一线都没带，供给部的同志给他送来了二百元边币和十五条香烟，都被他婉言谢绝了。

王旅长对子女的要求非常严格，他那时共有三个孩子，大的叫庆娃（意思是在庆阳生的，可见他对庆阳有着多么深厚的感情），二的叫喜北，三的叫新民。他经常教育孩子要热爱党，热爱人民，热爱毛主席。要好好学习，尊敬老师，不要和娃娃打架，从小养成有道德、有教养、守纪律的好习惯。每次饭后，孩子们剩下的残汤剩饭，他都要让孩子第二顿再吃，有时他自己还吃孩子们的剩饭，边吃饭边给孩子们讲长征的故事，使孩子们从小受到革命教育，不但能遵守纪律，好好学习，还热心帮助别人。

一次吃饭时，他的大儿子庆娃只喝了两碗米汤就不吃了。王旅长发现后就问：“你为啥只喝米汤，不吃馒头？”庆娃说：“学校有几个同学，由于穷没啥吃，经常饿着肚子上课，有时还饿得哭。我要节省些馒头给这几个同学吃。”王旅长听后十分高兴，他叫庆娃吃饱，又多给装了几个馒头，让带到学校给几个同学吃。

还有一次，一位同志到王旅长家里看望他，那位同志指着他住的两孔窑洞说：“这就是你家的窑洞？”还没等旅长答话，他的三儿子新民把头一摇说：“爸爸说我们家住的窑洞都是公家的，不是自己的。”那个人和王旅长听后都高兴地笑了。

（五）

王维舟同志对党的事业一贯忠心耿耿。抗日战争时期，他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中央、毛主席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，遵照毛主席既联合又斗争的方针，积极发动群众，扩大统一战线，有理、有利、有节地打击和孤立了一小撮破坏抗战的反动分子。他亲自主持和组织了旅部民众运动科，负责组织和领导工会、农会、青年会、妇救会、自卫军、儿童团等群众组织，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，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，发动民众抗战救国，支援前线，号召广大民众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王旅长亲自带领各群众团体利用集会和文艺活动宣传教育民众，打击顽固分子和汉奸，广大民众纷纷参加我们组织的工会、农会、自卫军、妇救会。有很多青年报名参加了八路军和游击队，壮大了抗日救国的力量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庆阳县还是国民党的政权机构，伪政府一小撮反动分子，处心积虑地和我们争夺统一战线的领导权，提出一切要经过他们。他们见我们组织了“民运科”，就和我们分庭抗礼，组织了一个“社训队”，名义上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号，暗地里对付我们。可是他们的那个“社训队”很不受群众欢迎，参加的都是些土豪劣绅，国民党的甲长、保长、镇长和一些反动分子。

每当旅部民运科组织各群众团体集会，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

时，国民党县政府就给我们捏造罪名，说什么我们的民运科“扰乱社会治安”、“破坏抗日”，企图限制我们的活动。一次，庆城各群众团体集会，商量布置动员人员下乡开展抗日宣传工作，这时庆城伪镇长带了一股保安人员冲进会场进行捣乱，要我们解散组织，停止活动。一小撮反动分子的破坏行动激怒了群众，当场把他们赶出了会场，伪镇长仓皇逃窜。后来，这些家伙怀恨在心，要同我们打官司，伪县政府也为这些家伙无理辩解。王旅长知道此事后，亲自出马和他们展开说理斗争，他以抗日大局为重，民众利益为先，据理驳斥和揭露了敌人的罪恶行径，灭了敌人的威风，长了人民的志气。广大群众高兴地拍手称快，都说王旅长为我们撑了腰，鼓了气，今后再也不用怕他们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了。

（本文系王维舟同志的警卫员、退休老干部李有义同志口述，由程占功、李富、张金彤整理）

参加红军长征前后的回忆

董 邦

我是天水县董家山人，三岁时母亲去世，十三岁给本村一家地主放羊，每天早出晚归上山放牧，地主还规定回来时要砍一背烧柴，夜里睡在羊圈旁边一个和狗洞相似的小窝铺里，寒冬腊月穿不上棉衣，也没有鞋子，仍得上山放羊、砍柴。

我给地主放羊的第二年正是一九二八年，甘肃遭到了极大的荒旱，真是到处饿殍，哀鸿遍野。地主家粮食满囤不给长工吃，经常给我喝野菜糊汤。一九二九年春天我饿得难受，心想如果这样下去，只有饿死一条路。有天趁着一位姓陈的长工上山掐苜蓿的时候，我和他商量一道去城里吃粮当兵。我们投到冯玉祥的国民军第一路军，那时我只有十五岁，当了一名号兵。

这年冬天，冯玉祥和阎锡山联合反蒋（介石），冯把他驻天水的部队，全部东调。我当时仍用“如意”这个乳名，从这时起才改名叫董振国。部队东开经汉中向湖北进发，在襄、樊一带和蒋介石的军队打了一仗，冯军失利，便又折回汉中。越冬后，一九三〇年春，又由安康东开到河南新郑一带与蒋军作战。在这次战斗中我负了伤。正当我在新郑医院养伤的时候，冯军全部撤退了，我们没有随军走的伤兵，便被蒋军接管，伤愈后我便成了国民党中央军第九师的一名号兵。

此时我党在江西建立了革命根据地，在毛主席、朱总司令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共同努力下，纠正“左”倾错误路线，利用当时蒋冯阎战争的有利形势，使红军发展壮大，正如毛主席当时指出的“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”，许多地区先后建立了红军根据地。一九三一年夏，第九师从洛阳到汉口集中，又东开经九江到了南昌。此时我们才知道去打红军。我因为不惯南方气候的炎热，行军中患了疟疾。在兴国住了一个时期后，开往老营盘与红军接触，红军如猛虎扑羊，打得国民党军队落花流水，四处溃逃。在撤退中，我从第九师开小差出来，不料正碰上原冯玉祥部改编的第二十六路军的留守部队，便又被留在二十六路军七十三旅当号兵。七十三旅旅长正是董振堂将军，我到七十三旅约一星期后，部队即开往前线，同年十月到达宁都。

部队向宁都前进时，病号很多，日有死亡，士气低落，人无斗志。当时我们部队和红军距离很近，但没有开火。听说刘伯坚同志在这一时期曾来旅部几次，后来我们才知道刘是和总部参谋长赵博生将军、董振堂将军商谈起义问题，听说师长李松崑不同意，所以有一天总部下令组织人力去抓李松崑，双方开火，打得十分激烈，结果李松崑还是跑了。就在这天晚上，即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晚，国民党二十六路军在参谋长赵博生同志、旅长董振堂将军和季振同^{••}率领下起义，参加了红军。部队起义之

-
- 刘伯坚同志，在一九二八年大革命期间，曾任冯玉祥国民军的政治部主任，此时在党中央工作。
 - • 国民党二十六路军共有两个师，即二十七师与二十五师，宁都起义时主要为二十五师与总部直属部队。二十五师共两旅，同时起义，惟旅长季振同在起义后不久，又与国民党军秘密联系，拟率部逃跑，因此被扣押，结果如何，后无所闻。

后，即从宁都撤出，驻扎在郊外村子里。起义部队到处受到苏区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慰问。当时苏区市面由于军民团结，确比白区繁荣，社会秩序更比白区良好。我们二十六路军起义过来共三个旅，约一万余人，建立了红军第五军团，在整编后每连派来一位指导员和一位采买，官兵经常在一起开会、学习，真正是官兵平等，经济公开，上下一致，因此人人感到精神愉快，庆幸获得新生。由于给养合理而又比较充足，战士们身体很快都恢复了。

我参加红军那年，正满十七岁，由于投身到真正的革命队伍，使我精神振奋，身体健壮，常常听指导员讲话，参加开会，我的思想也逐渐开朗了。给我影响最深刻的是我们连队的指导员张昌旺同志，他虽然工作很忙，但还抽出时间和通讯员、号兵谈话。当他知道我是一个贫苦的孤儿，又有革命的政治热情，就介绍我加入了共青团。从此我在组织的培养教育下，逐渐懂得了革命的道理，提高了政治觉悟。

一九三二年夏，我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后，兼任了团总支委员。这时我已由连部号兵调为师部通讯员，师长是程子华同志，政委是宋任穷同志。我记得程子华同志拿上苏区的报纸教我认“打土豪、分田地”几个字，那种恳切热情的情景，至今历历在目，不能忘怀。

同年夏秋间，一、三、五军团离开苏区到广东去打国民党军，我军驻南雄县水口镇，打了几天，结果还是让敌军跑了。这次战事结束后，我被派到军部组织的支部书记训练班学习，学习时间三个月，当时参加这个训练班的只有十一人，学习内容是《党的基本知识》。因为我们都识字不多，结业考试时，有一位同志念试题，我们分别口答，考试结果，我的成绩最好，得了一百分。结业后正是一九三二年冬天，分配我担任连副指导员兼支